引言：关于形式文明的对话

一、文明的源头

刘波：人类作为地球上的高级智慧动物，已经存在了千万年的时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每想到此，脑海里禁不住会产生对祖先的崇拜，并在眼前浮现出祖先的身影：他们身挂兽皮，手握树枝，采食野果，围追狩猎，茹毛饮血，蜗居洞穴，生儿育女……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联想？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人人都有一种“祖先情结”。

许宏：我们今天之所以自称现代人，是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祖先。我们现在站立的足下，每一寸土地都积累着祖先流传下来的文明。说到文明，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有形、有量、有声、有色的物质文明。人会死亡，祖先也会死亡，但物质永远不灭。例如石器、陶器、铁器等等，它们因隔世而传世，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纪念碑。

刘波：远古时期，人们面临各类凶猛动物的威胁，同时要捕杀弱小动物，以果饥腹。结果自然地选择树枝、石块作为武器，但这不能产生真正意义的文明。在人类对天然形态的树枝、石块施以人工之力，使其运用起来更为有效的时候，文明就出现了。人类对自然物质以智慧的能力进行改造，创造出新的功用价值。由此产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物质文明。

许宏：与此同时，群居的人类每时每刻都没有停止过思维活动，交流与沟通的欲望则促使语言文字的出现。不过，每一个家庭、部落、宗族，因了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会产生不同的生活经验；各种自然现象也会使人们产生各不相同的看法。当人们对客观世界试图作出解释、评价的时候，思维活动产生了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现代人称之为精神文明。包括人生观、自然观、伦理观、家庭观、宗教观、利益观等等在内的精神理念，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波：人们对客观事实所作的直接叙述和表达，并不包含精神文明。例如说：她从河边走向南山坡、满天星斗、月亮弯弯……这些都没有文明的痕迹。只有在表述客观事实的时候附加了人们的看法（评价），那些看法才能反映出文明的状态。

造物主给每一个人都赋予了思维的本能，这使得人类社会变得复杂起来了。在森林里居住的人们不愿意迁移到河边去；有人警告说狼群会在今夜袭击西山族营，但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等等这些问题，都会给生活秩序带来混乱，怎么办？

大自然给了人们充分的时间，来寻找解决群体内部诸多矛盾的方法——

婚姻：兄妹和父女不能通婚；本族人不能与外族人通婚……于是，人类形成了自己的婚姻制度。

生产：男人外出狩猎、劳作，女人养育后代、操持内务……于是，人类产生了原始的分工关系。

分配：获得的食物按人口数量均衡配给，剩余部分记数结转到次日分配……于是，人类开始掌握了分配规则。

权力：以年长或前辈为尊、以男性或女性为尊，尊者为上、尊者为主……于是，人类的群体内部形成了权力等级结构。

宗教：由地位最高者（例如族长）主持，带领人们祭拜天地鬼神，祈祷消灾去病……于是，人类找到了统一群体行动的原始程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这些被称为规则、结构、程序的东西，逐渐演化成为家庭、家族、部落的行为规范，成为人类社群的统一制度，这就是文明。这是有别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另一类文明——形式文明；这是有别于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另一类产品——形式产品。形式文明，是对原有制度文明所作的更广义、更高级的范畴界定。

许宏：根据学术研究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形式文明成果应该是婚姻制度。远在人类的原始群落时期，最初的婚姻形式是乱婚、群婚，即在人群之中不分上下辈份和兄弟姊妹皆可婚姻。后来禁止了上下辈之间的婚姻关系（血缘家庭），再后来又禁止了本族内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实行族外婚姻制度，形式文明由此产生。

其实，在现代社会中，形式文明无处不在，并且早已脱离原始形态而进入高级形态。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以及相应的学术成果和实践成果，都是形式文明的范畴。

以交通为例：在公路、铁路、水路、空路交通运输领域，各种交通工具和道路桥梁、设施设备等，代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人们的交通意识和观念，则是精神文明的体现；但是，一切与交通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则、政策，以及交通管理活动和这种管理活动所运用的机制、方法，即是形式文明。

形式文明存在的例证不胜枚举，但人们并没有普遍地、清晰地意识到它的真实性。这说明，人们的思维上存在着误区、盲区。面对埃及金字塔或中国古长城，你当然会赞叹它们的建筑工艺和伟岸躯形，或许你还会与古人的审美情趣产生强大的精神共鸣。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古人在修建金字塔和长城的过程中，怎样分工、怎样配置权力和责任、怎样指挥施工，以及相应的劳动关系和产权关

系。实现经济繁荣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是人人所关切的发展目标，但我们更关切的是这些目标的实现形式：制度、体制、方法和机制等。

刘波：在“议论纷纷”的现代社会，到处是“理论的丛林”。假设要在一片丛林里指认一棵特殊的树种，这是一件难事。最简单的方法是，绕开这片丛林，找到植物的源头，在源头区分物种的类别。

形式文明，是关于方法的文明，是关于人类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及其机制建设的文明。参与对形式文明的思考和探讨，并不需要高深的哲理，也不需要论战式的争吵，只需要轻松的心境和开放的胸怀。因为，形式文明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

二、文明的抉择：16 世纪的中国与西方

许宏：事实上，文明形态无法由人类自主选择，因为文明是由历史所创造的。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文明有极大的形态差异，并将其形容为“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皇权文明”与“人权文明”等等，显示其差距之大。回顾过去的 20 个 100 年，在公元 16 世纪以前，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上占据着人类文明领导者的地位。但在 16 世纪以后，人类的文明史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欧洲大陆开始崛起，亚洲大陆开始沉沦。因此， 16 世纪是一个历史分水岭。

在 16 世纪之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 300 项，其中约 175 项产生于中国，占总数的 57% 以上。中国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手摇纺车；到汉代出现了脚踏单锭纺车和提花机；三国时期出现脚踏 3 锭纺车；宋代出现 32 锭水力纺车和更先进的提花机；而欧洲，在 14 世纪才出现手摇纺车（比

中国晚了 1500 多年），16 世纪之前一直依靠“丝绸之路”来获得中国的纺织品。但在 16 世纪之后，西欧国家后来居上，出现了革命性的自动纺机，将纺线和卷线过程合二为一。英国在这一时期发明了以水力机械为动力的卧式织布机、起绒机、漂练机等，引发了一场产业革命，迅速成为了世界纺织工业的领导者。在冶金业方面，中国在公元前 600 年的春秋末期开始冶炼生铁，比西欧国家早了 1700 多年。但西欧国家只用 400 多年时间，就在 16 世纪达到了中国以 2100 多年时间达到的冶炼技术水平。在造船业方面， 15 世纪中国明代的郑和 7 次率船队远航西洋，每次“巨舶百艘”，其中最大的宝船长 48 丈、宽 18 丈，船队的各种工匠、水手、差役、医师、兵士等总数多达 27000 人。在郑和下西洋的 60 年以后，哥伦布远洋美洲，他所带领的船队只有 3 艘小船，总共 88 个人，最大的“圣玛丽号”仅 5 丈长、1.8 丈宽。这两只船队所代表的造船业水平，竟有天壤之别。但到了事隔 300 多年后的 19 世纪，西方国家却以威风八面的先进战舰，不可敌挡地轰开了中国的坚固国门……

刘波：在以上种种现象的背后，隐匿着文明的另一个层面——中国和西方在形式文明方面的差异。不可否认，中国在历史上也对世界作出了形式文明的贡献。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等等，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产生了丰富的文明成就，并且创造了以科举制度、井田制度等为代表的文明遗产。若要概括中国与西方在形式文明方面的历史差异，可以认为，中国是皇权、人治、重农抑商；西方是王权——人权、法治、重利重商。

中国的皇权：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击败争雄割据的六国诸侯，统一天下，创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取皇帝称号，开始了中国皇权的统治。由此，皇权经两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至辛亥革命结束，前后延续了 2100 多年。其体制特性是一切国家权力属于皇帝一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方的王权——人权：英国的封建专制王权从 1589 年都铎王朝建立开始（比中国由奴隶制度进入封建制度晚了 1700 多年），到 1640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止；法国从 1589 年的波旁王朝开始，到 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止。总体来说，王权在西欧只存在了 200 多年时间，然后迅速转入了人权制度时期。其政治理念是天赋人权，不可侵犯；体制特性是分权制衡。

中国的人治：以皇帝的“圣旨”为法律；以官职、官员、官言为权力主体；以德治人，以人治国，以国治民。

西方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以法治人，以法治民，以法治官。

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以户口制度禁止农民迁徙，奖励农耕；以“官商”垄断厚利行业，限制富裕商人的产生，对商业课收重税；以禁海政策限制对外贸易，严惩海盗、私船。

西方的重利重商政策：以国家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以“圈地运动”驱赶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商业劳力；支持富裕的贵族阶级进入权力部门；以轻税简征政策扶持工商业发展；以拓海政策鼓励海盗海商，鼓励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

许宏：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的形式文明走的是两条相反相对的历史道路。就其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而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是农户经济体制：农民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在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结构中，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化分工，基本只是“男耕女织”，对土地的彻底依赖性使得人们无法从农业转入工商业；而西欧国家长期实行的是庄园经济体制：以庄园领主为财产所有者，以为数较多的奴隶为劳动者，在较大的庄园土地范围内从事有组织的生产活动，甚至建立城镇，因此必然要进行劳动分工。与此同时，庄园经济使得地主阶级拥有更多更快的财富积累，可以扩大生产和投资于工商业。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欧国家的宗教组织长期地作为一支

强大的社会势力而存在，因此在每一次社会变革中理所当然地参与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这使得国家权力无法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集中于一人之手。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历史上，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由教皇统治国家，这种现象在中国从未发生过。直到 15 和 16 世纪，西欧国家由于新技术的广泛采用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向旧贵族阶级和教会提出了强烈的权力要求，由此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1517 年，德国由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新教运动随后波及整个欧洲。 1529 年，英王亨利八世召开国会，宣布免除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代表约克大主教的职务，并剥夺其公民权力和私人财产；1536 年，国会颁布法令，废止教皇对英国僧侣的最高管辖权、确认英国国王为教会的最高首领，从而确立了世俗国王对教会的绝对领导权。

应该说，正是由于西欧国家存在着国王（内阁）、贵族、教会三大政治集团，才使得君主专制体制不能成立，避免了中国那种长期固守于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命运。早在公元 1 世纪，日尔曼民族的公社共同体就实行了重大事项由贵族议事会商议、民众大会表决通过的政体形式。在西欧式的封建国家体制下，国王并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以“天下之大，莫非皇土”的资格向臣民分封土地，而是实行契约式的逐级分封：国王只能对他的直接附属封地享有契约规定的权利，而对于隔级附庸的封地则没有直接干涉的权力。因此，国家实行“贵族民主制”：1. 国王和他的主要臣属、附庸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 2. 国王是贵族中的一员，须由贵族们的拥戴才能成为国王；3. 国王须与贵族会议共掌国家权力而不能单独行使权力；4. 国王的权力只限于王室直辖领地，在此范围之外，每个封建领主就是他自己领地内的“政府首脑”。可见，这种政体形式，已经具备了现代西方联邦制国体的基本要素。

中国与西方在形式文明上的巨大差异，除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精神观念方面：在西方，富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经济独立而获得精神独立，因此

有条件发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以各种先进的“异端邪说”不断冲击正统观念和权威，致使社会思潮不断处于觉醒和开放状态，有力地支持了社会变革。与此相对照，中国历史上仅有春秋列国时期的一次“百家争鸣”，然后自秦始皇以来的 2000 多年，精神观念也与专制政体一样代代传承，僵化不变，使得每一种新兴思潮都被镇压于萌芽状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思想无法从本国历史中找到理论依据，只能从海外获得：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东欧的列宁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理论、人权思想、民主思想、法治思想等等，莫不如此。

刘波：还应看到，形式文明所包含的体制、制度、机制、方法等一系列内容，它们永远是为社会发展目标服务的手段形式或技术工具。相对于目标而言，形式文明就是一种过程性、技术性的方法。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目标和方法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机制，一旦二者发生错位，就会导致二律背反现象。

社会发展目标通常都是以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关系健康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应以这种目标取向为最高利益原则，据此设计和实施国家的体制、制度和管理机制、管理方法。这作为一种理论，通常都不会产生认识障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都不会产生歧议。但是，假若方法与目标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时，专制统治者或权力垄断部门则往往将方法当作目标，以维护自己的既得权利，而牺牲社会的最高目标利益。每当进行形式文明方面的改革和调整时，反对的声音总是来自那些在改革、调整中将要丢失既得利益的人们，这就必然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中外历史上，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工人起义、士兵起义以及各种政治反抗运动和政治镇压事件，都真实地反映了方法与目标的激烈冲突；而每次由统治者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则反映了方法与目标的和平冲突。

许宏：前面谈到，16 世纪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在这个世纪前后，中国与西方不约而同地发生了重大的改革事件：中国的张居正改革和西方的宗教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张居正领导的改革未获成功，所以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了；而由于宗教改革取得成功，所以西方国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对这两种改革的背景、形式特点和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与西方对形式文明的不同抉择。

1．改革的背景：

中国——改革之前出现了土地兼并狂潮，明初全国土地有 850 万顷，而到孝宗弘治 15 年却减为 423 万顷，减幅 50% 以上（《明经注文编》187 卷）。由于皇帝和王公贵族、官府的土地免交税赋，因此“官田”的无限扩张，直接导致国家税收锐减。加之地主豪强勾结官府，滥减滥免应收税赋，致使国库亏空，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必然不断加重对农民的苛捐杂役，这又造成大批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弃业逃荒，流民起义连年爆发，形成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同时，专制体制特有的内部腐败，统治集团的堕落，致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张居正（1525－1582 年）于 1572 年出任内阁首辅大臣（宰相），当时的神宗万历皇帝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综合说来，16 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国家与广大农民的矛盾。

西方——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和腐败骄横的教会形成了强大的反抗力量。16 世纪的西方社会，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教会的矛盾。当时的欧洲，罗马教廷是天主教会的国际中心，教皇是最高首脑。天主教会与世俗社会一样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庭、行政和财政机构，并通过各国的教主来控制和干预各国的内政。各国每年向罗马教廷报效大量贡税，仍然不能填满罗马教廷的贪欲。在英诺森八世（1484－1492 年）统治时期，在教皇所在地的罗马城，总共 6 万居

民中竟有 6 千多名为教会统治者服务的妓女。上行下效，西欧各国教会盛行腐败淫荡之风，很多女修道院实际上成了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妓院。为了满足这种奢侈生活的需要，教会采取横征暴敛政策，以放债取息、出售教会职位、发行“赎罪券”等等办法疯狂敛财。因此，新兴资产阶级以“廉俭教会”为号召，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炬。

2. 改革的特点：

中国——张居正明确提出，改革的宗旨是“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改革的方针是“强公室，杜私门”。其要义在于把政治权力集中于国家，把经济权益集中于政府，通过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平息激烈的社会矛盾。其改革的主要形式包括：行政方面实行“考成法”，督促和考核各级官吏的工作绩效和能力，运用竞争性的人事政策提高政府效率；经济方面兴修水利、清查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新税制。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一是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丁役合并为一；二是国家所需的力役，可以出银代役；三是赋役均以银两折算交纳，按田亩分摊征收。一条鞭法不仅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上赋役制度改革的重要事件，标志着赋役制向租税制的根本改变；按田亩纳税办法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均衡了地主和农民的负担；以银纳税则有利于削弱人身依附关系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综合来看，张居正改革是一场由统治集团领导人发起的自上而下的自我改良运动。

西方——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却是一场由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其特点：一是以新的宗教理论解放民众的思想，使这场改革运动获得了广泛支持。天主教的“原罪”学说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受诱惑而犯罪，后人被遗传了永恒的“原罪”，因此要行善积德并通过教会代为祈祷才能获得拯救。改革者指出，人们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就可得到拯救，根本无需教士

的监督干预、无需教会规定的仪式、无需向教会贡献财物和向教士做忏悔。这就否定了教会的神学权威和经济特权，肯定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二是宗教改革伴随着武装暴动，对旧体制形成了严重的打击。德国由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 年）发动和领导了本国农民战争；法国由宗教改革引发了长达 30 年的“胡格诺”战争。三是宗教改革的理论，流派纷呈，解除了人的思想禁锢，使社会接受了理论多元化、权威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现实，为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国家形式创造了条件。

3．改革的结局：

中国——张居正改革由于未发动社会民众参与，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开罪了那些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人。结果在张居正死后，改革的反对派立即进行疯狂报复和反攻，无能的皇帝听任他们对张居正实行抄家、开棺、逼其长子自杀，并定张居正为“千古罪人”。除了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张居正的改革政策尽被废除，由此给张居正改革划上了失败的句号。

西方——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在改革中创立了新教，新教通过战争和谈判，于 1555 年迫使德国教皇与新教诸侯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规定了“教随国定”和新旧教徒平等的原则，从而确定了新教的合法地位。随后，路德的学生、法国的加尔文（1509－1564 年）在瑞士日内瓦创立新教和“长老会”，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在法国，信奉加尔文的教徒组成“胡格诺派”,经 30 年的战争，终于在 1598 年取得合法地位。以西欧各国新教的合法化为标志,宗教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三、工业革命：创造与积累

刘 波 ：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这 300 年，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固有的“超稳定结构”，延续着小农经济的田园牧歌和“大一统”的专制政体。即使在社会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无数次农民起义，但每一次农民起义之后，仍然不可避免地回归于传统的形式轨道。即使有几次农民起义获得了成功，其结果也仅仅只是“江山易主”，国家体制仍旧沿袭了“千年一贯制”的文明遗产，继往开来。

在这个时期，中国既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也没有产生近代的形式文明。究其原因：一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目标，因此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没有内在的自发要求；二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将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以维护“祖制”为政治目标，这本身就对新科学、新文明的产生构成了障碍。

许宏：然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却发生了以伟大的“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浪潮，人类世界的面貌为之改变。伴随着工业革命，形式文明以前所未有的节奏开始了创造与积累的历史进程。

17世纪初，英国的羊毛加工业已经遍及全国，羊毛织品达20种以上，呢绒出口占英国全部出口的80%以上。造纸、肥皂、玻璃制品、采矿、冶炼、造船、军械制造等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以蒸汽机动力为象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大批农民被“圈地运动”赶进城市成为工人，由此完成了首次产业结构调整。

机械化大生产的直接结果是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但要由产品转化为商品，就需要贸易过程；将本国产品转化为国际商品，还需要国际贸易。因此，工业制造部门内部进一步生产分工，出现了以贸易为专业的经营机构——公司。

公司的出现，是经济领域形式文明发展的一个大事件。其意义在于，公司从生产制造部门脱离出来，发挥了市场销售的专业组织

职能，这是由产品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所不能缺少的实现形式。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以比较各个产品的质量、价格和品种，向制造部门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充当了市场裁判和向导的角色，这等于替政府履行了市场组织者的义务。另一方面，公司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机构，它的盈利目标决定了它必须自愿地承担市场组织者的义务。

工业产品生产的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否则就会因产品过剩而出现经济危机。所以，贸易公司又自觉地替政府履行开拓国际市场的义务并收获自己的利润。正是由于有了公司制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英国人经营的莫斯科公司、摩洛哥公司、东方公司、利凡得公司、非洲公司、东印度公司等，成了英国政府经济扩张政策的自愿执行者。

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航海船只，船越大、载货量越大、利润越大。于是商人们要求造船厂提供越来越大的船。但对于海外贸易而言，造船是一项很大的投资，船越大、投资越大、风险越大（海上航行可能遇到海盗、风暴、触礁等意外）。在收获利润和防范风险这一矛盾中间，商人们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求解决之道。结果，他们找到了股份制公司这一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共同出资组成公司，按各人的出资额度和比例分享利润、分担亏损与风险。这种经济组织的机制形式是：一能将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投资，开创个人力不能及的产业，因此具有信用制度、融资方式的功能；二能分散意外风险损失，预防个人破产的发生，因此形成了风险防范与承担的责任机制；三能利用这种机制形式，较快地组织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经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从形式文明的层面来说，股份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对现代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按常识进行推理，个人独资开办的工厂或公司，企业资产属个人所有，一切管理规章均由个人制定和决断，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就主要取决于企业主的性格、素质、经验、观念

等个人因素。而股份制公司则不同，它将国家法律的公平、公开、公证原则引入了企业组织内部，同时也将企业组织内部的管理实践作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国家法律的内容。可以说，股份公司即是契约组织——它是以全体出资人共同签订的契约为基础而成立的。这份契约的主要内容就构成了“股份制”的实现形式：

1. 公司的名称及注册地址；
2. 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经营期限；
3. 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其职务；
4. 公司的资本金总额、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和出资方式；
5.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式和风险承担方式；
6. 公司的决策程序、决策机构和管理机构、管理方式；
7. 公司的终止或破产清算方式；
8. 其它约定事项。

股份制公司的成立，改变了单一所有制公司所一贯遵循的企业组织方式，产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公司内部出现了二个以上的财产所有者，并且在他们之间产生了法律关系；二是，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拥有了合法的制度操作手段，不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正因为有二个以上的财产所有者，决策过程就成了协商过程。而为了实现合法有效的协商，则必须制定相应的程序形式，对协商参与者的知情权、发言权、表决权给予公平保障。为此，公司的股东们组成议事机构——股东会，对重要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并按股份比例表决决定。

股份制这种公司组织形式，对世界范围的第一次工业文明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效地扩大了私人对工商业的投资。然而，经济发展和形式文明的发展，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仍以股份制公司为例：由于股东个人的原因，有人希望其股份能够转让给他人、并且有人愿意接受；同时有人愿意投资持股但又不能参与经营管理。为了满足投资人的各种要求，同时也为了更方便地募集资金，股份制公司终于在 20 世纪迎来了证券化时代：一部分股份

制公司将其股份以证券（股票）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售，成为“上市公司”，并由此形成了股票交易市场和以有价票据为交易内容的证券行业。

上市公司的出现，进一步导致了股份制公司的社会化。其主要标志：一是公司股份被社会大众广泛持有；二是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信息向社会公众开放。以此为标志，上市公司成了区别于个人独资公司、私人合伙公司、一般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开放式公众公司。

刘波：考察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工商业的组织形式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工场化时代：这是工商业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初期阶段。工场的大量出现，是因为原有的小型家庭手工作坊不能容纳发展中的商品生产规模、不能满足专业化大批量生产活动的要求。因此，工场只是对家庭手工作坊生产组织规模的扩大，并未产生新的形式文明，但这是工业社会所必须经历的过渡阶段。

工厂化时代：这是蒸汽机和电力能源所造就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阶段。工厂化意味着投资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一系列伟大变革，也是形式文明的创造力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工厂化所带来的财产所有制多样化、工业制造活动的专业化、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的科学化等等，极大地丰富了形式文明的内涵与外延。这一时期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承包制、合伙制、流水作业方式、劳动分工制度、劳资关系政策、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分配和福利制度、破产制度、就业制度、劳动安全制度、财产制度与财务管理制度、培训制度与培训方式、信用制度与货币政策、金融制度与结算方式、专利制度、医疗制度、税制与征税方式、财政政策及人口政策等等等等，这些伴随着工业化而创造、积累起来的形式文明成就，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社会财富。

公司化时代：这是社会经济重心由制造活动向商业活动转移的

变革时期。由于工业技术的进步和成熟，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制造能力空前增加，因此商品流通体制和贸易形式就成了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特别是股份制度的运用，促进了贸易公司和工厂之间的紧密结合，导致工商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占据了主流地位。例如集团式的公司体制，突破了工厂制的局限，实现了科研、工业、贸易等不同产业属性和行业类别在体制内的集约化经营。在这一时期，财产的股份化促进了产权交易，进而带动企业兼并浪潮迅猛发展；企业法人制度则将经济组织纳入了法制化管理轨道；另一个特征即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空前繁荣，并且其经营规模超过了作为“第二产业”的传统工业制造行业。

证券化时代：这是一个由“实物经济”向“价值经济”转变的标志阶段，也是向未来的信息化时代发展的过渡时期。由于上市公司数量和财产量的增加，社会财富大量地以证券形式快速流通，而每一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都在敏感地、频繁地波动，其价值波动所形成的差异包含着一定的利益和风险。因此，证券买卖就成了一种更高级的投资与经营方式。其妙处在于，投资者省略了生产和贸易环节、不必懂得有关专业技术、也不必拥有各种有形资产和大量的蓝领工人，而只要以自己的市场知识与货币作资本。这种“价值经济”的魅力，造就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基金组织、证券公司、证券代理人，也造就了大量的证券交易所、期货市场、外汇交易所、会员证、俱乐部。显然，证券化时代也造就了一种开放式、松散型的以委托合同为联系纽带的经济组织形式。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和形式文明，接下来将要进入信息化时代。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当然，上述几个“时代”，并不能单纯以时间为划分界线，因为社会发展与形式文明的发展一样，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尤其中国这样的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各种“时代”特征被压缩在同一时间内并存，也不足为奇。

四、网络时代的形式文明

许宏：正如一些未来学家在 20 年前所预言的那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要把人类推进到信息社会，世界面貌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且，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将远远超过以前的历次新文明浪潮。

对于“网络时代”这个概念，很多人所关注的重点是网络化的通讯技术（其核心是机器）；而实际上，网络时代的核心价值应是网络化的结构：信息传递方式、组织运行方式、人际关系状态等等，都由传统的垂直、封闭的金字塔形态转变为平面、开放的网络形态。网络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对这种形式的运用将要产生新的文明。

在过去的 100 年里，传统工业模式使人们习惯于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把大量资产注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力积累资产以保持竞争优势。但在未来的 100 年，合作将成为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知识和信息将成为主要的生产力来源。“合作”就意味着把供应商、制造商、销售代理、中介结构、投资人、员工等等，以网络形式组织成为一个结构。并且，这种网络结构还必须是社会化的，仅有局部的网络结构则无法运行起来。以电子商务为例：银行若不参与这种网络，就不能实现商务资金的结算和支付；与商务内容有关的产业或行业若不参与这种网络，就不能实现商品实物的配送和交付。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正是由于受体制方面的阻碍，尚未形成社会化的网络结构，所以单凭网络通信技术无法有效地经营电子商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滞后的形式文明水平，正在损害着全社会的利益。

刘波：中国长期实行以国家（政府）为权力主体的“管制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